

武昌佛学院的历史沿革

王劭曼¹, 黄浩铭²

¹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武汉

²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湖北武汉

【摘要】本文梳理了武昌佛学院的历史沿革, 将武昌佛学院的历史变迁分为三个阶段: 初步开创时期(1922-1926); 动荡和传承时期(1926-1984); 重光与开拓时期(1984 至今)。武昌佛学院是中国第一所现代佛教教育学校, 为中国佛教现代转型作铺垫。通过审视武昌佛学院的历史进程, 可以认识到武昌佛学院对中国佛教现代化的独特路径, 对中国佛教现代化的贡献与意义, 为宗教中国化、现代化工作提供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武昌佛学院; 太虚法师; 人间佛教; 宗教现代化; 宗教教育体制; 宗教史

【收稿日期】2025 年 12 月 9 日

【出刊日期】2026 年 1 月 6 日

【DOI】10.12208/j.ssr.20260008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Wuchang Buddhist college

Jieman Wang¹, Haoming Huang²

¹Hubei Colleg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Wuhan, Hubei

²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Abstract】 This paper trac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Wuchang Buddhist College, dividing its development into three distinct phases: the Founding Period (1922–1926); the Turbulent and Continuity Period (1926–1984); and the Revival and Expansion Period (1984 to present). As China's first modern Buddhist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Wuchang Buddhist College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Buddhism. Examining its historical trajectory reveals its unique path toward modernization, its contributions to Chinese Buddhism's contemporary evolution,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advancing the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religion.

【Keywords】 Wuchang Buddhist College; Master Taixu; Humanistic Buddhism; Religious modernization; Religious education system; History of religion

引言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近现代佛教高等学府, 武昌佛学院的历史就是中国佛教现代化转型的缩影, 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佛教教育的专业化、制度化、体系化。在百年的发展历程中, 它曾有创办世界佛学苑图书馆的辉煌, 也曾因战争的冲击和资源不足而停学, 最后在新时期实现了重光与复兴, 至今仍是中國佛教界的一颗璀璨明珠。习总书记指出: “宗教工作是一项全局性、战略性工作, 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关系党的执政基础巩固, 关系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 关系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①宗教的教育制度就是宗教工作中的重要部分, 关乎宗教的教义传承、教

职人员的素质以及宗教与社会的关系。研究武昌佛学院的历史沿革, 可以让我们了解到中国近现代佛教工作者在一次次挫折中仍不放弃办学、弘扬佛法的坚定信念, 还对解析中国佛教的现代化转型、近现代佛教教育制度变革与中国现代社会与宗教的互动关系有重大学术意义。

1 武昌佛学院的历史变迁

1.1 筚路蓝缕的开创历程(1922-1926)

武昌佛学院诞生于 1922 年, 要了解武昌佛学院的来龙去脉, 一定绕不开它的创始人太虚法师和创立时的时代背景。太虚法师 1889 年出生于浙江海宁, 是中国佛教现代改革的重要推动者, 一生致力于构建现代

作者简介: 王劭曼, 宗教学博士; 黄浩铭, 本科;

^① 习近平《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 565 页.

汉传佛法体系,被誉为民国四大高僧之一。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剧烈变革,新旧思想激烈碰撞,而传统的佛教制度已然僵化,僧伽热衷于功利化的宗教仪式,思想不纯,轻视戒律,无法适应社会的变迁。面对清末民初的“庙产兴学”运动的进一步刺激,不少佛教界人士都开始反思中国佛教该何去何从的问题,太虚法师就曾在寄禅和尚的追悼会上呼吁对中国佛教的教理、教制、教产进行变革。太虚法师还撰写《整理僧伽制度论》,赴日考察佛教组织制度,创办《海潮音》刊物,为佛教改革事业做准备,他主张佛教要与时俱进,把弘扬佛法同社会发展相结合。武昌佛学院的创立意味着太虚法师的改革实践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对当时过分重视白衣的支那内学院倾向和囿于一宗的华严大学进行有力回击,也为后来太虚法师倡导人间佛教思想、建设立足中国本位的新佛教奠定基础。正如明贤法师所说:“创办佛学院是佛教革新的第一要务,也是太虚大师事业的真正起步。”^①

1922年武昌佛学院的筹办工作开始,3月,武汉居士决定在归元寺举行佛学院筹办会,李隐尘、陈元白、王森甫等30余人成为创办人开始捐赠资金。4月,李隐尘与太虚法师在武昌通湘门内千家界对黎邵平空宅非常满意,决定以此作为院舍,随后逐渐完善讲堂、寝室、厕所等基础设施。7月成立佛学董事会,梁启超被推选为董事长。胡子笏、皮剑农等人还根据太虚法师的《佛学院大纲》,吸收了日本佛教课程和教学体制,草拟《佛学院章程》。最终在1922年9月1日举行了正式的开院典礼,中国历史上第一所佛教高等学府成立,拉开了中国佛教振兴的序幕。

武昌佛学院在创办初期取得了一定成果,佛学院的讲经教化工作有序开展,学生招募也顺利进行,“寒假间,游化于沙市、荆州、宜昌枝江等地,皈依者数百人。”^②第一期学员中有后来的法尊法师、法舫法师、苇舫法师等等。同时,聘请空也法师、陈济博、史一如等佛学人才授课。随后佛学院人士参与了中日佛教交流活动,成立女众院。

1.2 战争动荡中的薪火相传(1926-1984)

初期的繁荣是短暂的,随着中国局势愈发复杂,北

伐战争如火如荼,1926年武昌佛学院被迫停办,房屋也被军医处征用。直到1928年师生才陆续返回。

这次冲击并没有摧毁武昌佛学院,相反,佛学院在战火后焕发了生机。1928年,太虚法师西行,在巴黎发起了以“昌明佛学,陶铸文化,增进人生之福慧,达成世界之安乐”为宗旨的“世界佛学苑”,并且将筹办处定于武昌佛学院。此外,还在伦敦发表《告全球的佛学同志》,倡导建立一个世界性的佛教组织,推动世界各地的佛教信徒、研究者相互交流。武昌佛学院开始突破了单一国家、文化的限制,体现了中国佛教的现代转型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世界相关联的。世界佛学运动以武昌佛学院为根据地开展。1932年,世界佛学苑图书馆建设工作开始筹备,并宣告成立。世界佛学苑图书馆的研究人员最多有20人,设有《海潮音》《正信》编辑部,藏书达2.24万种、2.42万册、1.11万卷,大藏多达有6种^③。

1933年,太虚法师在题为《世界佛学苑之佛学系统观》的演讲中,提出依据佛法把世界佛学苑的工作分为教、理、行、果四个组成方面,这给图书馆研究员与世界佛学研究方法提出了要求。

这一时期,武昌佛学院成为了太虚法师思想的发轫地,最著名的就是太虚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与新佛教革新的理念。人间佛教的思想第一次提出是在1932年太虚法师的演讲《怎样建设人间佛教》中,武昌佛学院的《海潮音》与《正信》两部刊物均记载了其内容。人间佛教是中国近现代佛教的代表性思想,又名“人生佛教”。传统佛教的弊病在近现代不断暴露出来,教职人员忙于各种表面的宗教仪式,比如忏法、水陆法会,并且僧侣内部素质低下,拉帮结派,斗争不止,僧尼们沉浸在往生、鬼神的幻影中,漠视社会,腐朽的传统佛教迫切需要改变才能适应现代社会,人间佛教就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了。杨曾文认为,“太虚所说的人生佛教是指密切结合人生,努力改善人生,以人生为基础的大乘佛教。”^④太虚法师不赞同传统佛教脱离大众、隔绝社会去“做鬼做神”,解脱得道,他认为佛教信徒应该重视现世,用佛教的道德、关怀众生的人文精神来改善社会,“使人类进步”。这一改变帮助佛教更好地

^① 明贤. 太虚大师在武昌佛教中国化的探索与领航[J]. 中国宗教, 2024, 04: 52-55.

^② 隆醒《武院重光: 庆祝武昌佛学院创办100周年暨全面复学》第36页.

^③ 武昌佛学院简介(2011-05-11 12:42:47), 2025年11月30日访问

https://baike.baidu.com/reference/2153923/533aYdO6cr3_z3kATPGDmP33MS3DNYz-v7DVU-BzzqIP0XOpSoLqXcYh6dk-sPRoGUXIvtdxL9QZme-VDhhM7fMVJ7w1Q7Ui3yn3Vi2ajeO6.

^④ 杨曾文《太虚的人生佛教论》《太虚大师全书第35卷》第119页.

融入现代社会,我们可以把人间佛教看做是佛教中国化的当代形形态^①。太虚法师的关于佛教革新的观点主要记载在他的演说《新与融贯》中,这里的“新”包括两层含义:“佛教中心的新”与“中国佛教本位的新”^②。“佛教中心的新”意味着要以佛教为中心适应时代形成新佛教。太虚法师认为,佛教如果不“适应时代”、“契合众生”,就会失去生命力;如果不坚持佛教的核心立场追求新,就会失去佛教的根本信仰。“中国佛教本位的新”指以中国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佛法脉络为根据,基于中国目前与未来的需要,吸收各时各领域的佛教精华,反对过分地倾向西化与日化,他认为中国佛教本位的新有两个原则:一是扫去中国佛教不能适应中国目前及将来的需求的病态;二是揭破离开中国佛教本位而易以异地异代的新谬见^③。这两个理论都反映了武昌佛学院在推动中国佛教现代化转型的过程始终保持初心,与时俱进,结合中国国情实际,将现代化与中国化成功融合,为今天宗教中国化提供了范例。

1938年,由于抗日战争,武昌佛学院再次被迫停学。日军占领武汉后,洗劫了世界佛学苑图书馆的藏书,佛学院的寺院房屋也遭到毁坏。但是佛学院的运动并未沉寂,太虚法师以人间佛教的思想唤起信徒们的国民意识,让他们认识到自身是国家的一份子,以佛教的力量号召佛教徒们同仇敌忾、奋勇抗日。早在1933年,武昌佛学院就参与了东北救护队救治东北伤亡军民,全面抗战爆发时,太虚法师就发表《告全国佛教徒书》通电,同年指导僧俗救护队。太虚法师还致电日本佛教界,发表《告全日本佛教徒众》,呼吁日本佛教人士抵制政府对中国的侵略。

抗战结束后,教职人员试图修复佛学院,重新恢复办学。1947年太虚法师圆寂、建国后学院被征用、没有经济支持、新中国的一些政治运动等因素都导致办学迟迟得不到实现。

1.3 新时期的重光与开拓(1984至今)

在改革开放时期,随着环境的改善,不少原来武昌佛学院的人才决定复兴武汉的佛教教育工作:1984年昌明法师主持,归元禅寺开设僧伽培训班;1987年,连溪寺开设爱道培训班,由昌明法师和隆醒法师担任教;1991年宝通禅寺开设僧伽培训班……许多佛学院

的老校友都在其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这些佛教教育的恢复工作共同促进了武昌佛学院的重生。1992年,中国佛教协会在上海举行了全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由中国佛教协会汇总赵朴初亲自主持,他提出当前佛教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培养佛教人才。这为武汉佛教事业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恢复武昌佛学院的提议得到许多佛教界人士的支持,也得到了资金资助。1992年12月21日,武汉佛教协会确定了武昌佛学院的领导层,解决了场地与资金问题。1993年,为了进一步响应中国佛教协会号召和赵朴初提出的培养佛教人才的倡议,湖北省、武汉市的佛教协会、武汉市宗教局以及佛教界权威人士在宝通寺召开工作会议,一致决定恢复武昌佛学院。1994年4月8日,武昌佛学院的预备班举行开学典礼,许多佛教大德与宗教相关部门的领导都有参与,佛学院恢复太虚法师的优良传统,教授佛法戒律、丛林制度,阵仗之大,许多杂志都有报道。1994年,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武昌佛学院继续办学,昌明法师出任院长,爱道培训班成为武昌佛学院尼众部。搁置了几十年的佛学院在新的时代涅槃重生,太虚法师的遗愿也最终实现。

重获新生的武昌佛学院绛帐生辉,教泽流芳,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佛教工作者。佛学院的教学工作不仅按计划进行,而且还不断革新发展,例如2000年11月,尼众部第一届律学班开学;2006年尼众部俱舍研究班开学;2010年10月和2013年佛学院的教职人员参加了汉传佛教讲经交流会等。除了佛教教育本身取得了巨大进步,佛学院的教育设施也得到了改善,1998年,武汉市佛教协会出资35万扩建教学楼,面积达300多平方千米,2012年8月,教学楼面积已经达到1600平方米。佛学院还改造校舍,更换课桌,为教师提供电脑等现代化教学工具。

2017年,在太虚法师圆寂70周年之际,武昌佛学院教学楼奠基仪式举行,这是武昌佛学院全面办学的前奏。在2019年国家宗教局正式同意武昌佛学院作为以佛学为基本学科的佛教基本院校,全面恢复办学。2021年4月24日,庆祝武昌佛学院建校99周年暨全面恢复办学揭牌仪式在武汉举行^④,同年10月,武昌佛学院复办后的首届开学典礼在宝通禅寺隆重举行^⑤。

^① 圣凯,楼宇烈,学诚《人间佛教思想文库·赵朴初卷》

^② 隆醒《武院重光:庆祝武昌佛学院创办100周年暨全面复学》第92页

^③ 同上

^④ 罗一萌《武院重光-武昌佛学院建校99周年暨全面恢复办学》,载《中国民族报》,2021年5月12日

^⑤ 武昌佛学院 2021-10-14 11:16 武昌佛学院举行复办首届开学典礼,2025年11月30日访问

2 历史审视：武昌佛学院对中国佛教现代化的贡献与意义

当我们回顾武昌佛学院的百年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太虚法师对佛教的革新思想以及武昌佛学院的实践都是中国佛教现代转型的重要里程碑，推动了中国佛教形成一条独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在西方，现代化意味着政治上建立民主体制与程序化的官僚体系，经济上建立自由市场、实现机械化大工厂生产，追求效率，宗教上要求“祛魅”。现代化的过程都彰显了现代性，现代性的核心是理性^①，特别是强调工具理性。马克斯·韦伯认为，在现代社会，“我们知道或者说相信，任何时候，只要我们想了解，我们就能够了解；我们知道或者说相信，在原则上，并没有任何神秘、不可测知的力量在发挥作用；我们知道或者说相信，在原则上，通过计算，我们可以支配万物。但这一切所指惟一：世界的除魅。”^②进入现代社会，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祛除巫魅的、理性的世界，而宗教又是巫魅的代言人。贝格尔曾言：“宗教是人建立神圣宇宙的活动。换一种说法，宗教是用神圣的方式来进行秩序化的。”^③宗教原本是人为构建的神圣秩序来为人类不稳定的社会世界进行合理性解释，当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宗教这种神圣的力量就失去了原先合理化的对象，那么神圣的帷幕就会瓦解，宗教在现代社会如何生存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在传统的世俗化理论中，宗教的现代化意味着宗教同社会公共领域分离，构建人的私人化的内心世界。可见，西方社会中现代性的实现要求基督教与公共社会的分离，这样人们的重心就会由彼岸世界转为世俗世界，可以更好地创造利润，提升效率。

如果说，基督教的现代转型是一种“隐退”，是神圣同世俗的分离，那么中国佛教的现代转型就是兼顾宗教性与世俗性的“再生”，太虚法师创办武昌佛学院就是中国佛教现代化转型的生动诠释。佛耶两教的现代化道路不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两教的根本性质不同。基督教信仰的神是不存在于我们这个世界的、超验的、全能的，认为灵魂与上帝具有实体性，救赎是通过外在的、超凡的恩典。佛教则是源自释迦牟尼的觉悟，这一

自觉表达为“觉悟不死”，也表明“发现了自苦解脱之道”^④。主张“无我”“无神”，不承认恒常的实体，解脱靠的是自身的修行，佛教没有基督教强烈的绝对化色彩，这就为适应现代社会提供了灵活的空间。不同于基督教在现代性和信仰之间抉择，最后脱离社会的公共领域，佛教则更加温和，佛教与现代思想、民主政治的激烈冲突较少，一些佛教思想甚至还契合现代的文化，不少佛学家会将佛教观念同现代科学、法治和道德观念相关联，佛教也没有基督教长期控制社会、制度化的传统。太虚法师首创了佛学院的教育制度，构建了严格的现代化教育系统，使佛教教育向理性的方向发展。武昌佛学院的办学深刻地受到太虚法师人间佛教思想影响，追求“人间改善”，不做“鬼的佛教”、“死的佛教”，无论是抗战时参与救助，还是今天培养爱国爱教的僧才，都反映武昌佛学院主张发菩提心，注重社会的实际功效。在“王师愈净潮”事件中，日本密宗兴起冲击了武昌佛学院，沉迷印咒的僧侣越来越多，对此太虚法师作《缘起抉择论》《论即身成佛》等反对这种“复魅”，维护武昌佛学院的宗旨，推动佛教理性化。武昌佛学院在佛教现代化的历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之后的佛教现代化如印顺法师发展人间佛教和星云法师的佛光山模式提供了借鉴。

3 总结

武昌佛学院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佛教面对近代社会变局的回应史、探索史、转型史。它发迹于清末民初的动荡时局中，由太虚法师的宏大愿力与佛教界人士鼎力相助和时代需求共同催生。从1922年创办后短暂的兴盛，到北伐战争的一度中断，从世界佛教图书苑的伟大创新，到抗战烽火中的弦歌不辍，再到改革开放以后的重光与开拓，武昌佛学院的命运始终与时代、国家、民族紧密相关。

其意义在于开创了中国现代佛教教育事业的先河，为日后“学院丛林化，学修一体化”的佛学院制度提供典范，促进中国佛教现代化转型。武昌佛学院的创办打破了传统佛教混乱的私相传授的状态，将现代学院专业化、系统化的教学体系与传统丛林制的戒律和集体生活有机融合，不仅弘扬佛法，还倡导佛教与社会交互，

https://baike.baidu.com/reference/2153923/533aYdO6cr3_z3kATPLYzfSIZifDP4-qvrPbW-RzzqIPmGapB4P1FJ836c828LI2BUXIv5Ute5kjc6_Cj43iZFle5psJdFC5AGhCkjmj

^① 汪民安《现代性》第5页

^②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第168页

^③ 彼得·贝格尔《神圣的帷幕》第33页

^④ 平川彰《印度佛教史》第1页

用佛教改善现实世界。中国佛教的现代化没有像基督教那样与世俗保持距离,而是保持自身宗教性的同时结合现代化的要素,继续积极地在社会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体现了东方宗教的独特智慧。

武昌佛学院的发展历程还为宗教中国化提供了借鉴,太虚法师坚持建设中国本位,始终坚定佛教信仰,在这些基础上建构适应当前与未来的新佛教。宗教的“中国化”或是“现代化”不是简单的被动等待,它要求高素质的宗教人才主动创造,坚守纯洁的宗教信仰,努力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要。武昌佛学院不仅是我們了解近现代中国宗教历史的窗口,更是一盏明灯,为中国宗教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之光。

参考文献

- [1] 彼得·贝格尔 P.L, Berger P L.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 [2] 隆醒法师.武院重光:庆祝武昌佛学院创办 100 周年暨全面复学[M].宗教文化出版社,2022.
- [3] 平川彰.印度佛教史[M].北京联合出版社,2018.
- [4] 圣凯,楼宇烈,学诚.人间佛教思想文库.赵林初卷[M].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
- [5] 汪民安.现代性[M].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6] 韦伯,钱永祥.韦伯作品集:学术 d 与政治[J].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7] 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2023.
- [8] 杨曾文,太虚大师.太虚的人生佛教论.太虚大师全书第 35 卷[M]. 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 [9] 单侠.民国时期佛教革新研究(1919-1949)[D].陕西师范大学,2012.
- [10] 何建明.从祇洹精舍到武昌佛学院[J].近代史研究,1998,(04):114-129+1.
- [11] 洪修平.太虚大师与当代的人间佛教[J].佛学研究, 2017(2):7.
- [12] 刘旭.“人间佛教”的问题及都市佛教研究[J].世界宗教研究,2011,(01):59-66.
- [13] 罗同兵.太虚对“东密”的理性抉择:从密教对武昌佛学院的冲击说起[J].宗教学研究,2002,(01):131-136.
- [14] 吕有祥.太虚法师与武昌佛学院[J].法音,1990,(01):32-39.
- [15] 明贤.太虚大师在武昌佛教中国化的探索与领航[J].中国宗教,2024,(04):52-55.
- [16] 明贤.太虚法师倡导抗日救国及佛教改革的一代高僧[J].中国宗教,2025,(04):48-51.
- [17] 明贤.新时代佛教中国化:佛教网络舆情监测与公共美誉度维护探究[J].世界宗教文化,2018,(06):12-19.
- [18] 明贤.禅宗的决定之趣与见道[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40(12):66-73.
- [19] 宋玉波.佛教中国化历程研究[D].西北大学,2004.
- [20] 徐弢,师俊华.佛耶比较视域中的《坛经》心性论和修行观[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66(04):32-36.
- [21] 徐弢,王劼曼.当代中国比较宗教研究的学术史考察[J].宗教学研究,2020,(01):252-257.
- [22] 严胜英.武昌佛学院佛学本位思想的建构[C].庆祝武昌佛学院建校 100 周年暨佛教中国化学术研讨会,湖北武汉, 2022-12-24,25.
- [23] 严胜英.太虚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对近现代佛教的重建[J].中国宗教,2023,(07):72-73.
- [24] 宇恒伟.略论中国佛教的世俗化与“人间佛教”[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2):99-102.
- [25] 源正.新学与新僧——武昌佛学院创办因缘考[J].法源(中国佛学院学报),2025,(01):72-84.

版权声明: ©2026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